



中古应制诗的 双重观照

程建虎 著

西安工业大学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中古应制诗的 双重观照

程建虎 著

●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淑元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文 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程建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 - 7 - 01 - 009041 - 2

I. ①中… II. ①程…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4319 号

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

ZHONGGU YINGZHISHI DE SHUANGCHONG GUANZHAO

程建虎 著

人 人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数:239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9041 - 2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唐代韩愈有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宋人欧阳修进一步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并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其所作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韩、欧两人都是大文豪，都强调诗人身世、际遇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重视悲愁忧愤之于诗歌感染力的提升，由此上承屈原、司马迁，有力地夯实了“诗可以怨”的传统，并一定程度地将那些属于“和平之音”、“欢愉之辞”的作品划入了另册。也因此，在中国诗歌批评史、研究史上，应制诗与省试诗一样，同属于不大为人看重的题材。而且，应制诗因是臣下奉和君主的诗篇，在命题、内容、语言、表现诸方面所受限制更多，作者身份亦属富贵阶层，因而更为人所忽略，并常常受到“典实富艳有余”（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微乏韵度”（杨慎《升庵诗话》卷八）的指摘。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类诗作又自有其特点和价值。且不说其历时久，数量多，在前后承传中已自形成一套创作的法式和风貌，也勿论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功用，即以其艺术表现言，因作者大都是宫廷文人，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其接受对象又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这就规定了其创作必然是认真的、有艺术水准

的。以唐代大诗人王维为例，其多首应制之作即不乏精品，而《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一篇最为典型：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
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

在拙著《唐诗艺术讲演录》中，我曾对这首居高揽胜之诗作过一个简单的分析：

从诗题看，诗人是在从大明宫（蓬莱）通往兴庆宫的凌空阁道中向下俯视的，如果平视是看不到渭水的，这里不仅可以远眺渭水、黄山（在今陕西兴平），而且可以近察千门柳、上苑花，特别是颈联两句，将整个长安城尽收眼底：“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云遮雨罩，一片苍茫，双阙高耸，春树如烟，千万人家鳞次栉比，在蒙蒙雨雾中构成了一幅壮观而迷离的画图。前人评此二句说：“美丽秀溢”（《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诗传画意”（《网师园唐诗笺》）。实际上，这首诗可以入画的不只此二句，沈德潜认为：“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阁道”句也是“诗中有画”（《唐诗别裁》卷十三）。从全诗看，整个就是一幅兼包远近、大小、广狭的俯视图景，如果今天让我们勾勒一幅当年长安城的缩略景观，那么王维这首诗是可以作为参照的。前人评论此诗的意境和作法之妙，认为：“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在结构上，“一、二不出题，三、四方出，此变化之妙；出题处带写景，此衬贴之妙；前后二联，俱阁道中所见之景，而以三、四横插于中，此错综之妙。凡皆妙于遣调也，而七、八立言得体，则又妙于命意也。一、二远景，五、六近景，二联全景，三、四半景，‘迥

出’字写出‘从’字‘向’字之神，‘回看’字写出‘留’字‘望’字之神。”（《增订唐诗摘抄》卷三）“起二句，先以山川将长安宫阙大势定其方位，此亦擒题之命脉法也。譬如画大轴画，先界轮廓；又如奕棋，先布势子，以后乃好依其间架而次第为之。三、四贴题中‘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五、六贴‘春望’，贴‘雨中’。收‘奉和应制’字。通篇只一，还题完密，而兴象高华。”（《昭昧詹言》卷十六）仔细体味这些评语，可以使我们对此诗的立意和构图之法获得更深的体认。

可见，这首诗的特点除了立意、构图外，还表现在词语、意象、法度、气势、格调等方面，同时，它在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方面，也能给后人以相当的启迪，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这还只是就一首诗而言，倘若将视野放开，对自汉末至唐五代这一长时段中上千首应制诗予以个案分析和整体观照，对应制诗这一作者群体的类型特征及其因特殊身份而在当日诗坛发挥的影响予以考查，对这类诗作更其丰富的政治意识、文化内蕴予以开掘，那么，这些不被看好的应制诗恐怕会为今人打开一片新的认知天地。

大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程建虎博士一眼觑定中古时代的应制诗，利用读博的三年时间，对这一沉寂已久的“富矿”予以全力探查和开采，并以《中古应制诗研究》为题，于2007年圆满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而后又用两年时间整理修订，推出了这部《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

这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大的文化语境观照应制诗，详细分析了应制诗作为意识形态建构、象征符号和文化资本的不同特点，对其在思想史、社会政治制度史、文化史及意识形态史等方面的意义予以揭示，并由此出发，考察士人在专制君权下的人格嬗变和心路历程。下编立足于诗学语境，系统考察了应制诗的起源、特

点和审美价值，并就应制诗对和诗、诗歌律化、咏物诗及诗歌用典的影响予以深入论述，从而在一个新的视角下，界定了应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平实而论，建虎君这种立足于文化语境和诗学语境的双重关照，是颇具深度和新意的。注重文化语境，使其大大扩展了考察的范围，对研究对象获得多元解悟；注重诗学语境，使其围绕文学本位，对研究对象的艺术特点和功能获得深入认知。他不仅小处着眼，对一些个案予以深入辨析，使得诸多应制作品展示出独特的面貌，而且大处用力，就应制诗之历时发展及意义外延、价值功能予以首次系统性的考察，使之获得全新的阐释和评估。换言之，他的宏观考察，没有离开具体的微观探析，而其文本细读与个案研究，又以宏观的视野亦即整体研究之需要为归宿，因而便将小结裹与大判断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与一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多精于实证而疏于理论有所不同，建虎君一方面对相关文献和数据有着细密的考察和把握，在研究之初即对应制诗之概念、性质等予以界定，对汉末至五代的应制诗篇予以细密的排查和统计，得出宋前共有应制诗 1251 首（其中晋前 6 首，晋诗 23 首，宋诗 21 首，齐诗 49 首，梁诗 225 首，陈诗 41 首，北魏 4 首，北齐 15 首，北周 49 首，隋诗 48 首，唐诗 740 首，五代 30 首）的结论，从而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汲取中外社会学、文艺学、心理学、计量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借以开阔视野，探求新的阐释向度，以期获得意义的增殖。如第二章考察应制诗之仪式化和符号化，便是通过统计，获得应制诗中“仪式”内容占有高达 62.51% 比重的基本数据，接着对其仪式化特点予以分析和概括，并分别以“公共领域和精英团体”、“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二端归纳其社会原因和心理学原因；第三章考察应制

诗的文化资本，借助计量分析法概括出唐五代应制诗在物象使用、结尾反应方式等方面的高度模式化倾向，继而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将应制诗视为一种在场域中行动者进行竞争的优质文化资本，透视其由此形成的政治性、工具性和功利性特点。在该书下编的形式美学考察中，作者除以传统诗学理论展开分析，还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舞美效果理论、装饰美学及传播学知识，对应制诗进行跨学科的综合观照，从而使得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都具有相当的新意和启迪。当然，借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在易出新意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不够贴切、准确的问题，倘若处置不当，会影响到研究的科学性和信实度。这种情形，在建虎的文章中似乎也可看到一些踪影。

建虎来自民风厚重的关中地区，心性古直，处世认真，于学问一途用力尤勤。在珞珈山读硕读博的六年时间里，他广览博取，慎思笃行，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史根底，在研究能力上有了一个大的提高。看着他由最初未窥治学门径的生涩、粗疏，而至后来可以自由驰骋的纯熟、老到，我是打心眼里高兴的。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建虎在治学上具有一种可贵的坚韧和毅力。记得在他读博不久，其父即因车祸而受重创，长期卧病在床，而建虎身为独子，对其父又怀有远超一般人子的感情，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频繁地往来于武昌和西安两地，既要照顾病父，又要赶写论文，可以说是身心俱疲了。然而，建虎竟能在这样的情境中克服两难，按时完成并提交他的博士论文，并在答辩会上获得高度评价；此后不久，又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奖励，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所谓天道酬勤，某种意义上，这大概也是对建虎努力的一种肯定和慰藉吧。

建虎书将出版，索序于我，理不当辞。写下这些话，既是一个

介绍，是对往事的一份忆念，也包含着对建虎日后治学的一种期望。

尚永亮

二〇一〇年三月于珞珈山麓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1
一、转换立场:知识和意义的双重关注	1
二、建立文化语境:空间的拓展和意义的增殖	6
三、“诗无达诂”,“以意逆志”——立足传统诗学, 融会中西理论	12
四、关于应制诗的几个问题	20

上编 文化语境中的应制诗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应制诗	29
第一节 《诗经》的意识形态功能	37
第二节 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新阐发:意识形态功能 的转化和强化	49
第三节 从“美刺两端”到“纯粹颂美”:汉儒诗学 话语和汉大赋的演变	60
第四节 应制诗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向应试诗的 转移	70

第二章 作为象征符号的应制诗	81
第一节 应制诗的仪式化和符号化	81
第二节 公共领域和精英团体:应制诗仪式符号化 的社会原因	88
第三节 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应制诗成为象征 符号的心理学原因	98
第三章 作为文化资本的应制诗	106
第一节 应制诗的模式化	106
第二节 应制诗:一种优质的文化资本	112
第四章 作为政治风向标的应制诗	121
第一节 从应制诗看儒学与政权的接近和疏离	122
第二节 从访寺应制诗看佛教的社会政治地位 及其与儒学的关系	139
下编 诗学语境中的应制诗	
第五章 应制诗的起源和嬗变	165
第一节 应制诗的起源	165
第二节 唐前应制诗风流变	173
第三节 初唐应制诗风格的递嬗	190
第四节 盛唐至五代应制诗风的演进	199
第六章 形式美学视域中的应制诗	210
第一节 应制诗的遣词特点	213
第二节 舞台美术效果和现场表演感	223

第三节 应制诗的装饰效果	228
第四节 传播学视界中应制诗的形式美	238
第七章 应制诗的类别及特点	249
第一节 应诏、应令和应教诗的区别及特点	249
第二节 四言应制诗和杂诗应制诗的“冒头” 特色及其成因	260
第八章 应制诗在诗歌史上的贡献	270
第一节 应制诗对诗发展的影响	271
第二节 应制诗与五言诗的律化	283
第三节 应制咏物诗对咏物诗的影响	298
第四节 应制诗对诗歌用典的影响	309
参考文献	318
后记	326

绪 论

一、转换立场：知识和意义的双重关注

应制诗因其形式和内容的高度模式化而历来不被关注，处于诗歌研究的“边缘地带”。古人虽然有不少应制诗选本，如《文苑英华》、《唐雅》、《历朝应制诗选》等，但论及应制诗时则着墨甚少，蒐罗几条如下：

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皆典实富艳有余。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

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余，而微乏韵度。

（杨慎《升庵诗话》卷八）

虽以一事之微，而铺张陈写，曲尽其变，猎秘搜奇，穷绮极丽，顾盼而兴风云，唾咳则成珠玉。

（何良俊《唐雅序》）

应制诗体必须冠裳珮玉，以正格为主。

（吴汶、吴英《历朝应制诗选》文汇堂刻本凡例）

曹丕建章台公燕诗，王粲曰：“尝闻诗人语，不醉且无

归。”应玚亦曰：“且为极欢情，不醉其无归。”子建曰：“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玚亦曰：“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一时燕集之作相袭如此，岂偶然同耶？

（安磐《颐山诗话》）

韩昌黎，众称其文起八代之衰，乃其文不在应制诗赋，而在《排佛》一表《退鳄》一约。

（葛昕《贺凭溪郭世兄乡荐序》）

前几条提到“富艳”、“典实”、“绮绘”、“冠裳佩玉”、“相袭”，指出应制诗形式雕琢、用典用事繁密、诗旨单调重复的缺点，后一条指出昌黎的成就在其《排佛》、《退鳄》之文，而在应制之作，从中可见应制诗赋在评价标准中所占的比重。

今人由于受到历史简单化及文化一元论的影响，对应制诗更是极少关注，文学史中甚至不会提及^①。近些年虽有学者涉及，但都不是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作为宫廷诗的一部分，在研究时附带观照，如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宇文所安《初唐诗》和《盛唐诗》、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等，尚未见有着力者；单篇论文更是只有寥寥数篇涉及应制诗，或只论个体作家的应制之作。可以说，在当今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深度不断强化的学术界，应制诗被完全忽略了。

应制诗数量颇夥，自建安年间邺下文人创作出第一批应制诗

^① 游国恩先生《中国文学史》对应制诗未做评价，袁行霈先生只是在论及虞世基时说：“所作应制诗《四时白纻歌》、《奉和望海诗》等，着重于词采的华美和对仗的工整，纯粹是为作诗而作诗。”参见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起,直至清朝,应制诗的创作可谓瓜瓞绵绵,其中“惟唐为盛”^①,据笔者统计,宋前共有应制诗 1251 首^②,其中晋前 6 首,晋诗 23 首,宋诗 21 首,齐诗 49 首,梁诗 225 首,陈诗 41 首,北魏 4 首,北齐 15 首,北周 49 首,隋诗 48 首,唐诗 740 首,五代 30 首。与其他部类诗歌相比,应制诗在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品格——审美功能方面是单薄的,尽管这些作品获得了毋庸置疑的主流话语地位,甚至被认为是“极人间乐事”^③,但审美功能的相对薄弱使其无法成为传统研究的“显学”。如果我们改变研究立场,由传统的只关注知识本身转向对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就会发现应制诗是一脉沉寂已久值得开垦的“富矿”。

我们知道,任何言说和文本都既是知识系统,同时又是意义系统。传统的学者认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研究就是求真,通过考据、排比、检索、梳理,或诗史互证,或探赜索隐,揭示某种提法的真伪,阐明某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生成、发展及影响,论述某作家和作品的艺术特征及源流嬗变等,这些固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但同时也限制了阐释空间。任何话语和文本都是一个意义和价值系统,从历时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不断被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意义的可能。如果我们进入到言说的意义系统,会发现这是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既有对象原本的意义,

^① (明)吴汶、吴英:《历朝应制诗选》文汇堂刻本,凡例,《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7 页。

^② 此数据根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彭定求等《全唐诗》,王重民、孙望、童养年等《全唐诗外编》,李昉《文苑英华》及吴汶、吴英《历朝应制诗选》等书统计,具体诗目详参附录。

^③ 清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并头联句,交颈论文,宫中应制,历使属国,皆极人间乐事。”(清)张潮撰,许福明校注:《幽梦影》,黄山书社 1991 年版,第 29 页。

又有不同时期及当下的意义，同时在这个广阔的视域中，对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生成新意，从而有助于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具体到应制诗研究。应制诗无疑具有一个完备丰富的知识系统，有独特的体制，排他性的题旨、遣词、意象及兴趣气象，虽嫌单一，但并非不值得探究。尽管这些诗被称为“体制复一”的“阿谀文学”，但不可否认其中仍有脍炙人口的佳作，其辞藻音律之美，结构韵度之妙，远非众多庸诗可比，如上官仪《早春桂林殿应诏》诗，“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一联，精致如工笔画出；李百药《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诗，尾联“日斜归骑动，余兴满山川”，蕴藉而余味无穷；宋之间《龙门应制》焕彩琳琅，流转如丸；潘岳《关中诗》雅润雍容，古朴典则，更不用说妇孺皆知的李白《清平调》了；而其被诟病的“穷绮极丽”和“富艳精工”，则具有形式美学特点，其装饰效果、舞台效果和现场表演感非他诗所能有。作为诗歌史上的一环，应制诗对其他部类诗歌的影响及其对诗歌技巧的贡献也是不容抹杀的，比如应制诗对诗歌律化和用典的影响及其与和诗、咏物诗、即席诗及应试诗间的互动，都说明它在文学史上仍有意义。我们应该看到，将应制诗置于文学研究领域（本文称为诗学语境），其诗学价值是相对薄弱的，其审美价值也略显贫瘠。如果对应制诗的研究只以“求真”为的彀，那么，我们除了得出前人所说的“典实富艳”、“微乏韵度”、“体制复一”等结论外，恐难再有更多收获。这也正是应制诗一直不被研究者重视的原因。

如果我们转换研究立场，在重知识的同时，关注其意义系统，则会拓出一片新的天地。有的言说和文本，其知识系统相对贫弱匮乏，但其意义系统却相当厚重充盈，只有从意义系统观照，才有可能对对象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并体会到其丰富的文化价值。

应制诗正具有此特点。我们把应制诗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之中,会发现它更多地具有思想史、社会政治制度史、文化史及意识形态史方面的意义,在心理、交往、民俗等领域都有鲜明的特点。通过对应制诗与《诗经》、汉赋的“互文本”关系的考察,我们除了发现其与《诗》、赋一脉相承外,还可了解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意识形态功能的继承、发展和演变正反映了士人与君权的博弈,展现了士人在专制制度下的心路历程,而诗歌也因此获得了除去抒情言志外的其他功能,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政治性;从交往的角度看,应制诗人具有“精英团体”的角色认同,其诗歌具有“符号象征”的特点,这个特点既反映出士人与君权的“合谋”,更表达了渴望获得肯定和归属的焦虑,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从场域的角度分析应制诗,则这部类诗歌完全蜕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变成可以用来置换政治权力的工具,诗性的弱化和政治意味的加强,除了赋予诗歌以新的特点外,也反映出诗人的情感和愿望;不同时期的应制诗都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格局、社会状况和士人心态,可被视为政治风向标;另外,应制诗中有大量风俗节令诗,其在民俗学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在文化语境中,应制诗孳生出大量的意义生成空间,而且这种阐释可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视角的改变和领域的拓展,应制诗的研究会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深化。对应制诗的意义系统进行挖掘和耙梳,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应制诗除了诗学价值外的文化意义,也许可算作本书的创新点之一。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与应制诗的诗学价值相比,其文化意义显得更充盈,更丰富,更具生发性,有鉴于此,本书在安排结构时,将应制诗的文化价值作为上编,置于其诗学价值之前。